

阿Q正传创作论

刘福勤

宁夏人民出版社

0.97

阿Q正传创作论

刘福勤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中卫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62千 插页: 1

198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 7—227—00048—6/I·12

统一书号: 10157·240

定价: 1.30元

目 次

序.....	(1)
第一章 暴露和讽刺的背面	
——《阿Q正传》·精神文明·鲁迅精神.....	(9)
一、为“第三样时代”的精神文明“清除地方”.....	(9)
二、《阿Q正传》与鲁迅的革命民主主义精神文明观...	(13)
三、在讽刺和暴露的背面是崇高的鲁迅精神.....	(19)
第二章 个性、阶级性、民族性的统一	
——论阿Q.....	(25)
一、鲁迅的“本意”.....	(26)
二、“国民的弱点”和阿Q精神.....	(30)
三、鲁迅“国民性”思想的发展和阿Q的产生.....	(33)
四、民族共同性弱点和鲜明的阶级性.....	(38)
五、民族性和阶级性在阿Q个性中的统一.....	(47)
第三章 灵魂丑恶的“新”派知识分子典型	
——论“假洋鬼子”.....	(54)
一、“假洋鬼子”，何许人也？.....	(54)
二、“模特儿”是谁？.....	(57)
三、鲁迅为什么要塑造“假洋鬼子”？.....	(62)
四、“假洋鬼子”的美学意义何在？.....	(66)
第四章 封建地主阶级的末代丑物	
——论赵太爷、秀才和举人之类.....	(74)
一、“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74)
二、各有特殊的丑恶.....	(78)
三、漫画式、嘲笑、憎恶.....	(81)
第五章 构思论.....	(83)

一、从“影象”的产生到“做正传”	(83)
二、作《序》便是全局的构思	(84)
三、人物为中心，故事剪辑如“蒙太奇”	(86)
四、具体形象、社会心理、作者精神三个层次迭合	(88)
五、收局是否“太匆促”？	(91)
第六章 语言论	(94)
一、人物语言	(94)
二、叙述语言	(103)
三、描写语言	(118)
四、议论语言	(126)
五、“四不象”的白话	(131)
六、对古典小说语言艺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137)
第七章 风格论	(148)
一、新的中国民族风格	(149)
二、风格的特异性	(160)
第八章 时代心搏的反映和作者特定心绪的外化	
——成因论（一）	(171)
一、所写的时代和作者的感应及在小说中 的反映和表现	(174)
二、写作时代和写作心境及在小说中 的反映和表现	(181)
第九章 鲁迅艺术美学思想的成功实践	
——成因论（二）	(197)
一、鲁迅艺术“启蒙主义”的形成、发展和 《阿Q正传》的酝酿	(198)
二、抱诚守真，如实描写	(203)
三、特异的艺术美的追求和创造	(206)
第十章 从《怀旧》到《阿Q正传》	
——成因论（三）	(214)

一、发轫——高峰·····	(214)
二、对辛亥革命的反映逐步深化和完善·····	(216)
三、“改造国民性”主题的发展过程·····	(221)
四、独创小说艺术的初试、发展和成功·····	(230)

序

《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品，并且早已“博得全世界的喝彩”（法国学者西蒙·莱斯语）。对这部杰作的研究，也不仅为中国学界所重视，而且早已成为世界性的了。

早在这篇小说于《晨报副刊》连载期间，茅盾就在1922年初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的《通信》中给了评论，肯定它是一部“杰作”。同年，周作人写了一篇“说明”性的评论《〈阿Q正传〉》。当时，他和鲁迅关系尚好。据周作人后来说，这篇文章是经鲁迅看过、认可后才在1923年3月19日《晨报副刊》作为周作人的连载组文《自己的园地》中的一篇发表的，署名仲密。所以，文章说：因为“同《阿Q正传》的作者是相识的”，“约略知道这著作的主旨”，所以“能够加上一点说明”。文章虽简短，却不但有关于“主旨”的说明，而且对阿Q的“类型”性（大致相当于“典型”）、阿Q的模特儿、讽刺艺术、语言特点和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一些颇为中肯的看法。茅、周的评论可以说是《阿Q正传》研究的良好开端。

1923年《阿Q正传》收在《呐喊》中出版。当时还较为幼稚的创造社批评家成仿吾于1924年1月首先在《创造季刊》

发表《〈呐喊〉的评论》一文，错误地认为《阿Q正传》只是“浅薄的纪实的传记”。但是，多数评论家和文学史家给了小说很高的评价。小说被译介到国外之后，更取得了世界的声誉。胡适作为文学史家于1924年11月在他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一书中肯定鲁迅是新文学创作“成绩最大”的作家，指出从《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诸篇小说“差不多没有不好的”。1926年3月2日《京报副刊》发表了孙伏园署名柏生的《罗曼·罗兰评鲁迅》一文，报导了《阿Q正传》被敬隐渔译为法文将在法国发表的消息，介绍了罗曼·罗兰对这篇小说的高度评价；同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梁社乾的英译本；同年11月，郑振铎作为文学史家肯定《阿Q正传》“在中国近代文坛上的地位”是“无比的”，并且预见“将来恐也将成世界最熟知的中国现代的代表作”（《“呐喊”》，《文学周报》251期）。

到了三、四十年代，中国几乎所有的著名作家、评论家和现代文学研究者都论及《阿Q正传》。随着英译本、法译本、日译本、俄译本的出现和逐渐增多，世界的读者，特别是日本、苏联、欧美的读者日益增多，《阿Q正传》的研究就成为世界性的了。六十多年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内外发表的有关《阿Q正传》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已经数以万千计，并且出现了几本专著。

可是，有些人不知出于怎样的心理，说：“鲁迅该跌价了。”他们埋怨：“老讲阿Q，讲得太多了！”他们认为：那么多有权威的学者研究过了，更有了革命导师毛泽东的评论，恐怕再没有什么新意见可讲了。

在《阿Q正传》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中，有课题和内容重

复的现象，有些观点和研究方法缺乏新鲜感，有的只是对革命导师或其他权威人士的意見的宣传甚至曲解。这些也许是某些人发怨声的客观原因。但是，我以为这是不必埋怨的，需要的倒是开拓研究的新路，再深入地去探讨，提高研究水平，催促有新角度、有新方法、有创见的研究成果的出现。

然而，发怨声的人，大抵是私下或在小型会议上发，大约他们也有点儿怕“冒天下之大不韪”罢。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弄文学的人——不，已经不止于弄文学的了，还有从事哲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心理学、语言学等等学问的不少人，仍然对《阿Q正传》感兴趣，几乎每天都有涉及阿Q的各类文章或书籍发表和出版。“该跌价”论者和埋怨者，即使大为头疼，大约也无可奈何。这实在也是没法儿的事，《阿Q正传》总是使那么多人认为有崇高价值，有现实意义，他们阅读它，研究它，不愿沉默，要说说有关阿Q的话，希望更多的人从《阿Q正传》得到启示和教益。你叫他们不说话，也难。

《阿Q正传》的生命力似乎越来越强，影响越来越深广。看来，恐怕要同《红楼梦》一样作为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光辉著作永远流传了。它所暴露和讽刺的社会现象、社会心理和人的丑陋魂灵某种程度的继续存在，是它不能如其第一章《序》中所说的“速朽”的原因之一——从这方面说，它的不能“速朽”是令人慨叹的。但它作为伟大的艺术作品永垂不朽，永远给人以生活的启示和独特的美感，令人“兴感怡悦”，永远是后来的文艺家创作的范本——从这方面说，它的不朽，则是中国文学的骄傲，中国新文化的骄傲，中华民族的骄傲。

对于文化遗产的研究，总是随着时代的推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而有新的进步，人们从新的社会阶段上去看过去时代的作品，站在新的思想文化高度，联系现实社会生活去认识它，总会找到有意义的新课题，总会用新的研究方法取得某些新的见解。对于伟大作品的研究尤其如此，更会从研究中得到新的启示。莎士比亚的戏剧，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屈原的《离骚》，曹雪芹的《红楼梦》，研究者均不止万千，百余年、数百年以至数千年来的有关论著，已可谓汗牛充栋，可至今仍然不断出现新的很有价值的成果。“研究到顶”论是没有根据的。《阿Q正传》研究，虽然也已有丰硕的成果，但可研究的新课题还多得很，已经提出和争论着的一些问题也尚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量才，量力，笔者不敢给自己规定全面研究的任务，只是基于上述认识，单从“创作”的角度来拟课题。最先是在反复研读原著的基础上考察了研究史上已经提出和争论的课题，及其结论，认为其中一些课题如阿Q的典型性、阿Q与革命的关系、作品对“精神胜利法”的描写和讽刺及其与作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的关系、作者的创作意图、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等，均有待进一步考察，进而着重从创作论的角度考虑，认为这篇杰作与作者的精神文明观、与“鲁迅精神”的关系、“假洋鬼子”等重要人物的思想和美学意义、作品独特的构思艺术、语言艺术、风格、作品的“成因”等，都应该作为专门课题作认真研究，以拓宽对这篇杰作的研究领域，构成系统。于是动手来写这本书。六十年代前期写了很少的一点儿，被迫中辍了，1978年才重新考虑来做这件事。因为才力不足，也因为生活仍然不怎么安定，断断续续到1983

年才写成这个样子。

“创作论”分为十章。

第一章主要论述《阿Q正传》的创作同作者前期的精神文明观、同“鲁迅精神”的关系，论述怎样从这篇杰作的阅读和研究中来学习领会“鲁迅精神”。

第二、三、四章，是人物论，主要论述主人公阿Q和“假洋鬼子”等几个重要人物的塑造，试图探索人物塑造的意图、意义、特点和美学规律性，并且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三章提出的主要观点是：第一，阿Q是个性、阶级性和民族性相统一的艺术典型，作者本意主要是画出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具有普遍性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借以暴露民族性弱点，促国人反省。阿Q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阿Q精神虽有某种程度的世界性，但主要是作品的客观效果，民族性和阶级性在个性刻画中得到较完美的统一；这个不朽的艺术典型是作者从辛亥革命前到“五四”前后在对社会生活和各种有关人物的深刻观察、思考之中，在其国民性思想和革命观的发展过程中酝酿而成的。第二，“假洋鬼子”是仅次于阿Q的又一个独立的艺术典型，一个半“土”半“洋”、不“土”不“洋”的伪文明的鬼魂，一个卑鄙丑陋而又投机善变的所谓“新派”半吊子知识分子典型；这个典型也是用鲁迅所熟知的多种模特儿拼合起来的脚色；他有独特的社会思想意义和美学意义。第三，赵太爷、秀才和举人，是末代地主阶级的丑物，是中国固有的所谓“精神文明”的代表者，他们及其“文明”是造就阿Q的根源；阿Q同他们阶级地位对立，而在精神上主要是统一的；作者对他们和对阿Q的态度的不同，在刻画时所用的艺术手段上也因而有

所区别。

第五、六、七章分别是构思论、语言论和风格论，是想通过对小说卓越艺术的较为系统、细密的分析，一方面认识其卓异之处，一方面从中寻找文学创作的普遍性规律。这三章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提出笔者见解：第一，创作前的构思有一个复杂过程，阿Q等人物“影象”的产生是创作酝酿的基础，明确的社会改造和艺术创新的目的统帅和促进构思过程的发展，决非心血来潮、匆促硬写之作；作品的文学构图，是作第一章《序》的时候大致想定了的，包括创作情绪的规定性、“讽刺写实”的小说体式的确定、主人公的主要经历和结局悲惨的命运、杂文式小说的基调的规定性等；其结构方法是将选取的生活细节“摄制”为各种彼此无直接联系的“镜头”，缀系于主人公性格刻画的轴心，这主要是吸取外国小说的优点，同时借鉴中国古典文学中某些优秀小说、史传和其他散文的谋篇方法，相融汇而创造出小说构图法；构思上最令人赞叹的是与内容的意图相适应，创造了“三索扭结、三层迭合”的结构，即把具体形象的描写、灵魂的塑造和作者的情思精心安排为从横向可透视的立体，这立体具有表面、中枢和背面三个层次，从竖向看则是三条索交织发展，统贯首尾，这是形成作品独特风格的要素之一；有人说这篇小说结构坏、收局促，这是没有根据的。第二，这部杰作是确立鲁迅语言艺术大师的地位的最有力的根据，其人物语言、叙述语言、描写语言和抒情议论语言都有多方面的独创性和极强的艺术表现力；作者在认真向群众、向古人、向外域学习语言的基础上创造了具有令人惊服的表达效果的“四不象的白话”，在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发展史上起了奠基

和桥梁的作用——本书“语言论”分六个部分作了详细分析论证，从内容和语言形式的结合上，从鲁迅的语言理论和《阿Q正传》的语言实践的结合上，从继承、借鉴和创新的关系上提出和试着解答有关问题。第三，在对什么是民族风格的问题提出见解的基础上认定这篇小说的风格是新的中国民族风格的一种典范，指出其风格的独异性在于它是融合了杂文的某些优点的、感觉性和哲理性高度统一的、幽默而又严肃、辛辣而隐含苦味的创造性艺术，这种特异风格是从鲁迅其人的风格转化而来，是主动接受古今中外综合影响的结果。

最后三章是“成因”论。笔者认为对这篇小说的研究中有许多问题聚讼纷纭、难于深入的关键性原因之一是人们尚未对“成因”作系统研究，于是从三个角度来研究这一课题。第一，从时代和作者心境的角度，认为小说是“时代心搏的反映和作者特定心绪的外化”。不赞成机械地从社会政治方面作比照的研究方法，试图从主客观的结合上挖掘作品成因的特殊性，并且更注重对鲁迅思想、性格，特别是当时的心理、情绪的特点在写作中所起作用和外化过程的考察。第二，从作者美学思想与创作的关系的角度，认为《阿Q正传》是“鲁迅艺术美学思想的成功实践”。既不赞成机械的理性论，又不同意非理性的创作论，而认为这篇小说是鲁迅当时美学思想的特殊性与艺术素养的特殊性成功地结合于创作实践过程的产儿。第三，从鲁迅小说创作的历史过程的角度考察，认为从《怀旧》开始的多篇小说是彼此密切相关、递相影响的一个系列，在研究其中《阿Q正传》以前全部小说的特点的基础上，分析它们对《阿Q正传》创作的准备作用，确定《阿Q正传》在这个结构过程中的地位，揭示其在

承前的基础上创新的奥秘。在上述三方面的考察中，还试图以这篇杰作的创作动因和成功因素的分析为桥梁进到文学创作一般性因素的探索，试图回答文学创作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努力才能达于较高水平的问题。

本书整个研究过程，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并且采取系统论的某些意见，将鲁迅的经历、思想、素养、风格各种主观因素与各种客观条件结合起来考察，将作品内容与艺术形式、手段结合起来考察，将对作品本身的分析同鲁迅其他作品联系起来，尽量详细地占有材料，从中抽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总之，是想使这本小书有严谨的科学性；目的，一是更有成效地学习鲁迅精神，更好地继承《阿Q正传》这份珍贵遗产，二是探寻创作规律，服务于当今的文艺创作。

这本书实际上做到的与想做到的之间，一定存在很大的距离。失当处，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

刘 福 勤

1983年11月写，1984年11月改定。

第一章 暴露和讽刺的背面

——《阿Q正传》·精神文明·鲁迅精神

一、为“第三样时代”的精神 文明“清除地方”

鲁迅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精神文明的一生。他在追求和战斗中形成了伟大的鲁迅精神，充分体现了一代精神文明，被公认为“民族魂”。

鲁迅对精神文明的看法和为开辟精神文明发展的道路所作的努力，以及他自己的崇高精神，往往表现在对堕落精神、腐朽思想文化的暴露和批判上，表现在对各种丑恶的和不健全的灵魂的解剖中。

《阿Q正传》就是作这种暴露和批判的。这部杰作可以说是鲁迅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精神的消极一面、对于当时所谓“中国精神文明”深入研究的结晶。小说写道：

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中国精神文明”被阿Q精神证明是天下第一，这是怎样的“精神文明”啊！

阿Q时代——“大团圆”之后这个时代还在继续——真是文明得可以！老大中国“根本剥丧，神气旁皇”，“寂寞为政”^①。黑暗无边，荆棘满地，到处是虎狼鬼蜮，而又有“狂蛊中于人心”^②。封建专制、帝国主义欺辱，加上他们的精神文化的毒害，使得人不是“真的人”（《狂人日记》）。人们的灵魂都变了形：大多数沉默着，麻木地沉睡着，有几个在叫，在挣扎，而那叫和挣扎多不是真的觉醒，而象是梦呓和酒醉似的。然而，当时的中国精神货店却特别多，而且无不高挂着“精神文明”的大招牌；实际上是中、西破烂摊，甚至是屠场、妓院、文字狱、刽子手训练班，还有鲁迅在《智识即罪恶》里所描写的那种制造呆子的魔窟——在那里，没有特殊抵抗力的人都会被杀掉灵魂，变成活死人，变成“满脸呆气”、“专以卖肉见长”的猪羊。阿Q就是他们制造的呆子，最后又被送上屠场。

鲁迅是封建主义“精神文明”的叛逆，对于中国某些人从西方拾破烂的所谓“新文明”也洞若观火；他认真研究了深受这些“精神文明”毒害的中国人的精神，对各种“精神文明”货色和老板们的丑恶灵魂也予以解剖。他要弄清国民精神的荒落与各种精神货店的关系，以期破除伪文明，引导沉默的灵魂“出荒寒”。

鲁迅认为中国精神界是“二患交伐”——“本体自发之偏枯”和西方“传来之新疫”^③。前者主要指封建统治者及其精神代表“死抱国粹之士”，他们以腐朽的封建礼教、伦理道德、文化桎梏、丑风陋习为文明，守旧泥古、孤立自是、

妄自尊大，而又卑怯虚弱之至。后者主要指盲目欧化的、新皮旧骨的“精神文明”，近不知中国之情，远不察欧美之实，貌似思想解放，实乃旧根性未变，拾西方尘芥，罗列于国人之前，“随波弟靡，莫能自主”，人云亦云，自相矛盾，“从于唱喁以荧惑人”，而且艳羨强暴，奴性十足，“灵台之中，满以势利”^④。《阿Q正传》以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暴露和讽刺了这两种“精神文明”。

麻木自欺、卑怯昏乱、奇丑不堪的阿Q魂，是两种伪文明的产物，不是独立的魂灵，没有独立的意志和思想，而被统治者的“意见和道理”所左右。阿Q以为革命便是与他为难，“深恶而痛绝之”，这“意见”和感情是哪里来的？要奴役和压迫别人等等思想、欺侮更弱者等等行为，还有关于女人的“学说”和“诛心术”等等，是从哪里来的？不都是来自等级制度、来自“圣经贤传”、来自拘囿着他的那些伪文明吗？阿Q魂是古今治人者用伪文明的“毒针”螫刺、麻痹而成的“不死不活”的魂灵，象被细腰蜂螫刺成“不死不活”的小青虫的状态一样。^⑤因此，这个魂灵标本也能部分地照出治人者魂灵的体格来。这是产品对制造者的反照关系。对阿Q魂的解剖，就是对造成这种魂灵的“精神文明”和社会制度的控诉和批判。就其在实际生活中具体矛盾的具体表现来看，阿Q魂主要是概括了那些在吃人制度下被剥夺、被损害、被麻醉的、“不死不活”的奴隶的灵魂。他们处困境而看不到希望，受欺辱而无力反抗，只有本能的自发意识，而无自觉的精神。他们的灵魂与他们的处境、命运是矛盾的。小D、吴妈等也都是这种奴隶，是小阿Q、女阿Q。因此，塑造和讽刺阿Q魂，又是为了激人自省，自觉，改变大小阿

Q、男女阿Q的精神，引导国民精神进向真正的文明。

如果说小说对阿Q魂的描画是对所谓“中国精神文明”的间接暴露和讽刺，那么，解剖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之流的魂灵，则是较为直接的了。赵太爷魂可以说是赤裸裸的吃人主义与卑劣的奴才主义的统一体，是对已经腐朽而还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阶级精神状态的高度概括，是对封建主义“精神文明”的实质的暴露。假洋鬼子和秀才，一个是“新”派，一个是旧派，但他们很有些共同点：都是卑陋的半吊子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无论新学或旧学都半通不通，但都借以自炫和愚弄百姓；都有上等人的“维新”或“博雅”的“文明”外表，而对下等人如阿Q则都极其野蛮凶恶；都为了向上爬而善于变化，很会投机。这两个人物集中概括了代表当时“新”旧“精神文明”的两类人物：“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和“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⑥。小说对他们的灵魂的解剖，更直接地暴露和讽刺了“新”旧两类“精神文明”的肮脏和野蛮。

冯雪峰同志说：“讽刺文学……是辛辣而严肃的，它有破坏旧的东西的社会目的，它的作用是属于新的一面的。……它在为新的东西清除地方，使其在地上存在，因而讽刺家也必定是理想家，就是‘不满于现状’之后，他知道有满意的现状会出来的”^⑦。《阿Q正传》正是这样的讽刺文学，鲁迅正是这样的讽刺家。暴露，讽刺，正是因为有所追求。扫荡传统精神中颓弛、荒落、腐朽的部分，批判“假洋鬼子”式的“文明”；疗治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国民精神”顽症，正是为“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⑧的创造及其精神文明的建设“清除地方”。